

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刘红旭

(西藏民族学院 法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人口流动意味着社会系统处于吐故纳新的循环状态, 表明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动态配置。阶层分化总是和人们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密切相关, 其中可见人口流动的状况。阶层分化的静态状况与人口流动叠加, 共同作用形塑了社会结构。改革以来, 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 先赋角色和后致角色同时决定的阶层分化, 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

关键词: 人口流动; 阶层分化;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12. 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23X(2014) 11 - 0093 - 04

社会结构不仅会呈现出构成和序列相对固化的静态, 而且始终处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互相作用、不断塑造的变化状态。社会结构的框架性能, 深深影响着社会变迁的方向。如果从马克思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断出发, 正常运行的社会应该为自由的人们创造一种合理的人口流动机制。社会成员或迁徙于大江南北, 或流动于不同行业, 每个人基于个人能力和生活需要, 能够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公平竞争、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遵循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构造的人口流动机制, 个体实现目标的手段与环境可用的资源是明晰的, 成本最小, 收益最大。得益于此, 社会制度、职业地位、市场规范和教育背景, 都会发挥各自作用, 促成一个依据社会成员的社会贡献能力, 形成开放、稳定、变化的阶层结构, 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一、巨大的人口流动与扩展的流动空间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生命有机体, 人口流动就好似消化系统, 只有新陈代谢才能保证吐故纳新, 维持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 人口流动以阶级成分为标准, 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设立, 几乎完全

形成两个独立运作的系统, 城市和农村交流只有工农业产品, 虽然借助考学、就业、参军和婚姻等途径, 可实现少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但整体被严格控制在很低的水平。随着改革政策的推行, 农村几十年人口生产造成的剩余人口, 宛如溃堤的洪水流向城市, 一定程度上是集聚的人口流动的“大爆炸”。却正好反映了人口流动人为制及向自然开放转变, 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从南到北、从农村到城市, 中国大地上每年春往冬归的大跨度、高密度人口流动, 演绎出一幅繁忙的春运景象。在此期间忙碌的角色——身份上是农民, 人口生产在农村, 职业上是工人, 劳动生产在城市, 构成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时至今日, 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群中, 从就读于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 到就职于各种岗位的白领, 都已经占据很大的比重。然而, 人们谈及中国人口流动, 几乎都会自然而然首先想到农民工, 人口流动研究也会主动把目光投向农民工, 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也始终考虑农民工。面对农民工身份二重性的尴尬, 面对农民工被撕裂的生产属性,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事实是, 正是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 才为中国社会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 才为中国建成小康实现全民中国梦奠定了基础。一个公平、正

义、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不能人为设置铜墙铁壁以出身论贵贱,不能掠夺一个群体及其后辈共享城市文明的机会,不能任由社会冷漠对待那些为美丽中国付出了心血汗水的劳动者。

健康的人口流动需要合理的制度保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1]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临时空交错的多重挑战和机遇,加之信息膨胀的因素,社会治理中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为了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和各类主体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市场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同样的道理,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规避因评价体系、人事变动、个人喜好等造成的政策失误与社会代价。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而言,社会制度要从根本上保障人们基于法律的平等地位,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履行相同义务的同时,享受相同的权利。当我们的社会切实建立了尊重每一个人公民尊严、尊重每一个公民权益的有效制度的时候,不同行业人才的跨界流动,才能促进人力资源最大程度优化配置。帕累托意义上精英流动的循环,才能保证服务于社会进步的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才。

健康的人口流动需要牢靠的社会信任。中国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每一位奔走于广袤中国大地上的社会成员,都希望融入工作的地方,付出自己的劳动,获得应有的收入。人是一个群体性动物,如荀子所言,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者,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不是凭借身体的生物机能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者,而是仰仗于群体生活带来的聚合。来自不同地域、有着相异生活经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确如中国古人所期许的那样求大同存小异,操持着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能够给彼此信任、缔造友情,就能够让流动的生活充满温暖。当然,社会信任成为人际互动牢靠的纽带,不仅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互相信任的感情基础,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信任基础上总量扩张的社会资本,并对破坏信任者课以重罚。维护社会信任源于人们的善意,创造社会的福祉。

健康的社会流动需要坚实的教育支撑。人力资源在市场环境中的配置情况,与人力资源本身息息相关。社会分工发达的市场社会中,每一

个社会成员遵循价值规则,出现在社会有机体的特定位置,发挥各自专长。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已成事实的当下,劳动者携带的教育背景,本身就暗含着一个预期的价值标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制与目标不同,却共同为社会输送各种类型的专门人才,成为人口流动获得最佳配置的前提。教育系统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要自觉整合到社会系统总体规划之中,致力于培养人格健全、专业扎实、品德高尚的专业人才,为健康的人口流动打好基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30多年的人口流动,已经产生“离土不离乡”“离土也离乡”两种主要的国内流动模式,甚至为数不少的中国劳动者跟随国家项目和华商的步伐跨洋过海,实现了中国人才流动遍布全球的现状。大跨度、高密度、多领域的人口流动,超越了以往政策的阈限,扩展到更大的流动空间。与此同时,政策松动释放的自由度,促成人口流动带来一定程度阶层分化,而社会结构的弹性也逐渐走到尽头,有限度的社会分化和相对固定的阶层边界清晰可见。

二、阶层分化与阶层固化并存

人口流动从方向上可以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前者可以看出人口流动的频率,后者却可以衡量人口流动的质量。如果把人口资源抽象化为商品,充分市场条件下人口流动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供给关系的隐性力量和国家政策的显性力量。事实上,即便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人口资源的商品化也不会走得很远,完全以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决定劳动者价值不合实际,毕竟个人携带的先赋和后致角色都会决定人口流向以及阶层地位。

列宁说过“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这个概念以经济结构地位决定阶级的说法,准确指出了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原则,曾经给中国大地造成浩劫,阶级概念中合理有用的部分,被阶级斗争饱含政治性的极端化滥用所掩盖,终遭中国社会的弃用。阶层一般用于指称具有相同或

相似经济水平和社会身份的社会群体,显然不同于阶级也不能表达阶级概念更为深层的含义。但是,这个更具中性的概念,逐渐代替阶级频频出现,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词汇。社会学中经典的阶层分类以人们的权力、声望和资本为标准,虽后来历经多种不同学者诠释改进,但似乎分析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贴切依据,还是韦伯这个最初的概括。简言之,权、钱和名,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成为社会阶层区分的标志。

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阶层分化是一个循环的套路。首先,人们因为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被划分在不同的阶层类型中;其次,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借由生活方式、交往圈子而相互区别;最后,阶层分化决定阶层地位,决定不同阶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难易程度,阶层边界由此得到确定。一旦阶层分化定型,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超级稳定的缘由。士农工商各自运转,所谓官之子恒为官,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直到不满于分化现状的底层精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起义大军推翻一个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并继续遵循相同的逻辑直到再被更新,如此朝代更迭。当然,历朝历代的治国者,不仅明了“得人者昌”“失贤者亡”的简单道理,也确实发展了一条人才选聘的机制,从汉朝的察举制直到隋唐完善的科举制。王朝的天下,形成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历史上汲取人才充入统治阶层,以保证阶层流动畅通、社会富有活力的做法,同样可见于现实。

教育,也只有教育的途径,使普通百姓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梦想有了归宿。中国社会之所以显现出开放、动态的结构转型特征,恢复高考以来相对公平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伴随着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环内转化之后,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口流动条件,越来越难以逾越阶层固化的边界。资源占有量丰富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一个成员相对固定的内部循环已然形成,内外贯通的新陈代谢不复存在。阶层分化的模式已经固定,人口流动的方向已经固定。相对独立的内部流动与绝对封闭的阶层屏障,形塑了特殊的中国社会结构。

三、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发展中的社会结构

人以群分,相同类别的群体除了大致相同的喜好,更重要的是所处阶层地位赋予其相近的生活方式。人往高处走,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化都包含着成功命题,个人价值得以彰显的最好表征,就是获得社会认可的角色地位。作为组成社会的分子,个体先天获得的性别、民族、籍贯、家庭出身和后天获得的教育、技能,都能够在社会空间中找到与之匹配的位置。寻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动力,激活了每一个社会成员不甘于固守的冲动,社会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动力。社会成员的构成、社会位置及其聚落、不同角色扮演者相互作用,都在型构社会结构。

寻找文化传统,构造中国语境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稳定结构,犹如岿然不动的庞然大物,维护了悠长的稳态历史。这样一种现代意义上落后的结构体系,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仅仅担负维护秩序的王朝政治和重人伦轻物理的文化谱系使然。这样一个滋生在中国土壤中的社会,连同清王朝腐朽的政体,难以抵挡清朝末年中国海域上横行的列强,在迎对器物背后强势的现代化瞬间显摧枯拉朽之势。中体西用,抑或全盘西化,中国社会亦步亦趋模仿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套全然不同的价值体系奠基,形成了中国非土非洋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的方向,阶层分化的标准,社会结构的模式,统统变成中国社会需要解答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反身向内寻找文化基因,与从未停歇的模仿相统合,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之意。

鼓励人口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安土重迁,黎民之性,乡土中国弥久的文化惯习,暗含着人们叶落归根的生命哲学。成群结队、游走四方的热情,让中国面孔全方位进入世界分工体系,国家利益随之漂洋过海。如果是开放伊始的大规模人口流出,主要是出于释放农村聚集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获取一份收入,那么,新一代农民工焦躁的流动,却导源于日益凋敝的村庄,和爱恨交加的城市。在世界政治格局成型和资源稀缺前提下,中国社会巨大的人口与有限城市容纳度,决定了城乡双栖的人口流动将长期存在。一方面,急速推进的城镇化之路,担负着新增人口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任重道远。另

一方面,粮食安全与土地托底的现状,都要求扩展农村建设的内容,至今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将长时间生活在村庄。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自然特征的分工,专业指向的现代分工淡化了个人先赋身份。从制度层面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创设公平、自由的人才竞争环境,并适时向农村倾斜政策,吸引人才回流带动农村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村追赶城市的步伐。

开放循环的阶层分化,共建弹性的社会结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是相对恒常的社会存在,人口流动蕴含的社会事实却无限可能。恩格斯说过,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 P166) 国家产生于化解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但一经产生就会发展出不同于社会的逻辑。国家与社会斡旋的结果,即打造一个服务于社会且有权力牢笼的政治共同体。公共权力侵入阶层分化,就会导致资源集中与寡头政治,窒息社会结构。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市场资源配置极大丰富了阶层分化的内容,保持着社会经济结构灵活生动,但是国家权力干预标注于人才流动的偏

好,会引导不正常的阶层结构。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看,服务于社会的政府公职人员,阶层地位获得的利益被剥离,接受监督的行政过程无利可图,就会自然丧失人才流动中绝对的集中趋势。

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正在生长的中国梦,鼓舞着无数为之努力的中国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让合适的人才到合适的岗位,做出最大的贡献,这就是合理的人口流动。不以出身论英雄,而以才干排座次,让所有有志于攀登事业高峰的人才有其施展的舞台,确保透明、公正、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就能够形成合理的阶层分化。社会因人而变化,人因为社会而改变,合理的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必将形成健康的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 译. 韦森, 译, 审.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2008.
-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LIU Hong - Xu

(Law School , Xizang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Xianyang , 712082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Migration means there is a metabolism cycle in social system , human resources are configured dynamically as commod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ization.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s always closely related to certain social properties , including the status of the visible population flow. Because of superposition of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tatic condition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 social structure is shaped. Since the Reform ,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changed hugely caus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with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 and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which was cast by congenital roles and status by self -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population mobility;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soci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左安嵩)